

日本的世界战略

● 李阁楠著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RIBEN DE SHIJIE ZHANLUE





国防大学 2 061 1705 8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日本的世界战略

李阁楠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长春

(吉) 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日本的世界战略

RIBEN DE SHIJIE ZHANLUE

李阁楠 著

责任编辑：吴长安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咏 梅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6.5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 - 5602 - 1516 - 5/D • 81

定价：2.70 元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自序

纵观日本近现代史，人们可以发现，日本是一个有目标、有战略的国家，并能以全民族为一个团队，矢志不渝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不轻易回头。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近代化目标基本实现；1931年至1945年的“大东亚圣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战后“经济立国”的目标奇迹般地获得成功；80年代以来向政治大国迈进的目标也即将成为现实。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日本国家的对外战略呢，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主要的有四点，即国力对比的变化，世界形势的变化，国民意识的变化，民族文化底蕴。其中后两个因素更能反映日本民族特性与日本对外战略的关系。

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很敏感，不断地追赶世界先进文明，总欲与强者为伍，争取世界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外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致力于“脱亚入欧”，战后实行“脱亚入美”，80年代末以来又出现了“回归亚洲”的动向。但大目标基本相同，都欲争当世界大国。

日本人追求“大”，譬如：“大日本”、“大和民族”、“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等，在一些表现名分的概念前面，常常冠以“大”字。现代的日本企业家和欧美企业家在经营战略上也存在明显不同点，欧美的企业

家重视现实利润，日本的大公司则往往联合起来，共同争取“产品市场占有率”，扩大世界市场，而不太计较暂时的利润得失。结果是，战后日本的电视机、录相机、汽车、机器人、半导体芯片等许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居第一位。

日本人追求“世界第一”、崇尚“大”以及向外扩张的思想，源于日本传统文化底蕴中的“独尊意识”，再进一步追根溯源，“独尊意识”产生于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教。日本人从远古时代就认为，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优秀民族”，这种优越意识已融于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日本文化的底蕴，一代一代绵延下来，它作为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顽固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则表现出强烈的“优胜意识”，当发现自己明显地落后于别人时，又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转而谦躬地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眼睛却一直盯着“山坡上的那朵云”。明治维新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表明，日本“民族优越意识”的起伏与日本对外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拙著从历史、文化、国民性、综合国力、社会意识、国际格局变动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书中各论题均是相对独立的。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偏颇之处亦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4年3月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轨迹

- 一、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及其演变 3
- 二、嬗变中的日美安保体制 30
- 三、日本从“脱亚”到“归亚” 41

第二章 日本对外战略与国民性

- 一、日本的“家”文化与国民性 57
- 二、日本社会活力之源 67
- 三、日本人的国家观与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 76
- 四、日本主义与日本对外战略的关系 88

第三章 处于新的转折时期的日本对外战略

- 一、国际格局的变动与日本 101
- 二、日本国会议员的构成及其变化 109
- 三、日本正在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 119
- 四、日美关系步入新阶段
——世界性的松散同盟 125
- 五、日本平成时代的政治家崛起 132

第四章 未来日本的世界战略蓝图

- 一、日本的新亚洲主义和全球主义 141
- 二、日本安全保障战略动向 148

三、日本的对外战略性援助.....	154
四、冷战后日美关系重新调整.....	164
五、日本的“新亚洲观”与“亚太大厦”.....	171
六、日本对亚洲安全保障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	177
七、日本政权变革及其原因.....	184
八、日本政权变革与对外政策走向.....	192

第一章

战后日本的 对外战略轨迹

一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及其演变

外交服从于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战前日本主要奉行军事外交，是对外侵略扩张的“策略”。战后，日本的目标是复兴经济，保障安全，提高国际地位，外交政策也为此目的服务。

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经济实力是日本外交展开的基础，在服从美国世界战略和维护日美同盟这一前题下，战后日本外交政策随着不同时期国家目标、实力的不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1年9月签订旧金山“和约”，这是战后日本基本外交政策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从1951年9月到1972年6月佐藤内阁垮台，此期间大约二十年，日本从属美国在国际上采取低姿态，依靠日美安保体制复兴经济。第三阶段，从1972年田中内阁成立到70年代末为日本外交政策调整时期。第四阶段，80年代日本从被动外交转为主动外交，充当积极的“西方一员”，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第五阶段，走向大国外交，以日美欧为主导构筑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

战后初期日本基本 外交政策的形成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一直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在这近七年的时间里，名义是盟军占领，实际是美军单独军事占领。日本完全丧失了外交自主权，虽然外交活动停止了，但是不等于没有外交政策。正是在这个期间日本战后的基本外交政策逐步形成，它体现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

由于战败投降，赖以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庞大军事机器崩溃了。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被解除了全部武装，迫使日本不得不从和平途径寻求自身的重建和发展，通过外交手段并借助外部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吉田茂说“败于战争，胜于外交”，用非军事手段达到日本的目的，这是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日本投降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战争经济也陷入了绝境。战后初期生产几乎完全瘫痪，军需生产停止，工厂没有原料无法开工，海外贸易断绝，1946年工矿生产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指1934—1936年的平均水平），粗钢产量56万吨，仅是战前最高产量的7%，农业减产三分之一，粮食严重危机，饥饿笼罩着整个日本，靠占领军救济粮每人每天配给约四两，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战败使日本变为四流国家。这样，恢复和发展经济就不能不成为战后日本的首要目标。战前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不足，无力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竞争，只能和军部结合起来推动战争机器运转，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夺取殖民地，获得原料和商品市场，三井、三菱等大垄断财阀跟在军力、战靴之后掠夺资源、推销东洋次货。战后日本垄断资

本适应环境的变化，企图依靠经济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作为内政继续的外交也必须为此目标服务，因此战后日本主要奉行的是“经济外交”，这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

日本被盟军占领对其外交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当时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由美苏英法分割占领，对日主要交战国中国、苏联等都没有派兵占领，只有英国象征性派了很少部队也很快撤走了，整个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就是以后成立的由美、苏、中、英、荷、法、加、印尼、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也没有实际约束力。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实施《波茨坦公告》，完全根据美国的意志和利益行事，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称为日本的“太上皇”。1945年10月25日美国占领军总部指令日本政府停止一切外交职能，日本的所有对外交涉都得通过美国占领军进行。当时外务省新设了“终战联络事务局”，专门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联系，如果把这称为外交的话，也只能和美国发生关系。

在日本没有直接实行军政，而是占领军总部下达指令由日本政府实施，进行间接统治。原来统治阶级中的天皇、皇族、重臣官僚等政界要人在投降初基本都保留下来了，就是以后虽然经过处罚战犯和开除公职，但也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换班，战前和战后有密切的联系性。战败第一个重要外交课题就是“维护国体”，统治阶级的重要人物近卫文磨早在投降前夕就说过，“从维护国体的立场而言，比最坏的事态（指战败）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将发生的共产革命”^①。1945年2月近卫给天皇的奏折中又说“战败虽属遗憾，但已不可避免”，“英美舆论还未涉及国体之改变，因而仅就战败而言，相信无需为国体而忧虑”，主张尽快结束战争。当时主和派和主战派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国体，以近卫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的实质是尽早向英美投降以维护国体，防止共产革命，也就是说在战败前夕，战

6 日本的世界战略

后日本外交政策的趋向就已孕育在其中了，事实上天皇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裁断的。投降签字之后，在 1945 年 9 月 3 日的枢密院全体会议上，日本一个老资格外交官芳泽谦吉说，虽然苏联向东扩张是威胁，但也可以认为多少对我国有利，因为出现了美苏在东亚互相牵制的局面，何去何从，我们希望把航舵转向争取美国好感的方向驶去。对此，代表日本政府签字投降的重光葵也表示赞同。天皇对战后日本外交的转向也起了一定作用，在 8 月 14 日天皇出席的最后决定是否投降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说“对于国体问题，虽有各种疑义，但我认为对方（指英美）有相当好意”^②，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显然日本统治阶级总体意志是企图利用美苏矛盾，投靠美国维护国体，保存天皇制，防止共产革命，维护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同美国结盟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早在战败酝酿投降时日本统治集团已本能地作了选择。

战后，继东久迩皇族内阁之后出任首相的币原、吉田都是在战前就主张和英美协调的上层外交官员，当时大垄断资产阶级不便于直接出面，而是支持这些有“资本”的亲英美政界要人维护他们的利益。战前垄断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推动者，战后初期虽然解散了财阀，但是不久由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开始采取保护和扶植日本大垄断资本的政策。战前的财阀又以银行为中心组成新的财团，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美国的技术、原料和商品市场，因此大垄断资本是战后推动日美结盟的重要力量。

美国的“冷战”政策直接导致日美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同苏联对立就逐渐公开化，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实际是向苏联示威，以确保美国对日本的单独控制权。1946 年 3 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号召西方建立对苏力量优势，1947 年 3 月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在全世界同苏联对抗，从此

美苏对立加剧，“冷战”体制形成。美国把反苏反共做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特别是当时中国革命节节胜利，使原来美国企图依靠国民党的中国遏制共产主义的设想落空，从而开始考虑把日本做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由打击、削弱转为支持和扶植，把日本做为反共反苏的前沿基地和亚洲军工厂。

从此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48年首先放弃拆迁赔偿政策，停止解散托拉斯，提出恢复和重建日本经济。在政治上美国占领军开始反对工人运动，加强对保守党吉田内阁的支持，打击革新力量，对共产党进行整肃，日美两国统治阶级出于共同的利益和信念企图建立亚洲反共阵线。

在战败初期，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已经开始考虑将来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委托联合国还是依靠某些国家的问题。1947年9月，社会党片山联合内阁的民主党人芦田外相，通过横滨停战联络事务局铃木九万局长，把以个人意见形式写成的书面材料，交给即将回国的美国第八军司令官转给华盛顿方面，材料中说，如果美苏关系恶化，从维护国家独立和国内治安来考虑“美军以监督和约的履行行为目的而留驻日本，或者日美间缔结特别协定，将日本的防务委托给美国。方法是在和美国缔结和平条约后，在日本周围保持兵力，一旦有事，美国即可在与日本协商的基础上，将这些军队进驻日本，这时日本应建立和维护可供美军使用的基地”^③。显然，随着美苏冷战开始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依靠美国而不是联合国保障日本安全的思想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前就初步产生了。同时也可以看出社会党右派、民主党和自由党一样，依靠美国安全保障缔结和约的思想是一致的。

战后初期保守本流外交路线的形成，主要是在吉田内阁时完成的，但并不只是由吉田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诸因素合力的指向。其中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单独占领，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转变，这些是基本因素。二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

8 日本的世界战略

量壮大，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统治集团为了保持国体，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等，这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战后保守本流外交路线的形成也经历一个过程，吉田茂可以说是集大成者。战后第一任首相皇族东久迩完成了投降手续，仅仅在任 51 天就辞职了。外交官出身并且战前就主张对英美协调的币原组阁，同美国占领军积极合作，在和麦克阿瑟总司令的一次谈话中币原首相就表示了日本放弃战争依靠美国的想法。1947 年 8 月 6 日社会党的片山内閣决定，把原来由外务省秘密进行的媾和对策准备工作，正式提到内阁议事日程，并把政府的媾和对策完全交给民主党的芦田外相处理。前面曾提到过，芦田外相交给美国政府的媾和意见书中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保障日本安全，这和后来形成日美安保体制的基本思想是相似的。1946 年吉田第一届内阁期间已经考虑早日媾和的问题，吉田在《十年回忆》一书中写到，当时对盟国的日常接触就是对媾和的初步磋商。1946 年 7 月 17 日，日本政府停战联络事务局朝海总务部长同对日理事会美国代表艾奇逊大使会谈时双方就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对日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1947 年 1 月 20 日朝海部长和对日理事会英联邦代表麦克马洪·鲍尔会谈时也提出希望早日媾和问题。由此可见，片面媾和、日美安保体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吉田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且是一脉相承逐渐完善的。

1948 年 10 月 19 日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此后片面媾和的步伐加快了，1949 年 5 月 7 日吉田首相第一次公开对外国记者表示“和约缔结后，仍希望美军留驻日本”^④。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发展，需要摆脱远东委员会的束缚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做为远东前哨基地，这种企图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日美正式开始缔结和约谈判时，杜勒斯说得十分明确“我们已经不想缔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而是考虑缔结友邦之间的条约”，美国不仅打算缔结宽大的袒护日本的和约，而是进一步想把日本纳入美

国的世界战略之中，日美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共同的利害需要，这是两厢情愿的媾和。1950年4月吉田首相命池田密使携带吉田书简去美国，信中说“日本政府希望早日媾和，为了媾和后日本和亚洲的安全，美国军队留驻日本是必要的，如果美国不便于提出的话，可以考虑由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这是吉田明确向美国表明片面媾和以及日美安保的具体方针。国内支持和推动吉田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是垄断财团，以“经团联”和“日经联”为首的财界八团体一致向杜勒斯表示，希望日本“在政治经济方面完全恢复自主性”，希望“美军留驻日本”^⑤。显然，没有财界的意志，吉田是决不敢冒然行事的。日本要借助美国重建经济，美国在全球推行冷战政策需要日本，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更加速了片面媾和的进程，这样日本完全从属美国的体制在片面媾和过程中逐步完成。

保守本流外交路线的制定人吉田懂得，被解除了武装的日本根本不可能靠军事手段达到复兴日本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经济，以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手段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1948年3月吉田在民主自由党建党大会上的致词中说“要把政治经济纳入正轨，完成重建国家的大业”。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增加外交发言权，提高其参与和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吉田凭其多年外交官生涯培养起来的敏锐感觉认为，只要美苏对立，美国就需要日本。这样日本投入美国怀抱，取得宽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摆脱巨额的赔款责任，否则复兴经济是不可能的。

战后初期日本避免重整军备。吉田在回答杜勒斯要求重新武装时提出了三条不能接受的理由，第一条是，如果拥有堪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匹敌的军备在经济上负担不了，对于战败的日本来说无论怎样努力也是达不到的，并且在国会上答辩时说“即使美国要求重整军备，我们也不能接受”^⑥。美国把日本做为远东反共基地，日本也正是利用了美国反共对抗苏联需要日本的世界战略，在